



[美] 德雷克·博克 (Derek Bok) 著 许志强 译

幸福的政策

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



美国国家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
美国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学者
哈佛第25任校长求是力作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幸福的政策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 

[美] 德雷克·博克 (Derek Bok) ◎著
许志强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1年第2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的政策：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 /（美）博克著；许志强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11

ISBN 978-7-5470-1690-9

I. ①幸… II. ①博… ②许… III. ①福利政策—研究—美国 IV. ①D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7975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京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230mm

字数：170 千字

印 张：16.25

出版时间：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袁 锋 张 旭

特约编辑：关雪菁

装帧设计：

内版设计：向丽蓉

ISBN 978-7-5470-1690-9

定 价：49.80 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传 真：024-23284521

E-mail：vpc_tougao@163.com

网 址：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10-89779339

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麓深处，有一个信奉佛教的小国，境内高山矗立，密林覆盖，布满冰川、河流与小溪，这个国家就是不丹。由于观光者鲜至，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不丹才为世人知晓。那时的不丹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贫困、文盲率高、婴儿死亡率高。然而，1972 年，这个偏远的国度却发生了令全球瞩目的改变。刚刚登基的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chuk）宣布，此后政府要以“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而非“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的主要尺度。在不丹的五年发展规划中，他宣称：“到规划末期，如果我们的人民感到还不如以前幸福的话，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

尽管不丹新政的一些细节工作尚未完善，但下面这“GNH 四大支柱”基本概括了幸福新政。

善政与民主化：尽管不丹人民非常拥戴他们的国王，但旺楚克认为，从长远来看只有民主才能保障民众的幸福。与其国民的意愿正好相左，这位颇受欢迎的君主期望逐渐将他的国家推向民主。他坚持分化自己的王权，赞成成立民选议会，由民选议会选出部长并组成执行委员会，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如今，他的王子已经继承了王位并决心继续坚持民主化进程。在现任国王的领导下，不丹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并于 2008 年举行首次全民选举，推选出了立法机构的成员。

稳定与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政府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因为许多不丹人还非常贫困。不过，从长远着眼，为了保持一种缓慢而稳定的发展，政府有意识地在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政府相信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被民众平等共享，尽管这一原则的确切含义仍然不太清楚，但它至少包括了免费的全民教育（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全民免费医疗。

环境保护：为了给下一代留下美好的自然环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策来保护环境，但同时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牺牲，例如，旅游业发展限制重重、禁止使用塑料袋、禁止吸烟（尽管遵守情况不尽如人意），以及通过税收激励机制和调节进口关税的方式促进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的推广。为了禁止滥伐林木，政府提倡使用电炉采暖，将大面积区域保留为国家公园，并立法规定国家森林覆盖率必须保持在 60% 以上。

文化保存：政府不但力图保留不丹传统文化的独特元素，而且大力宣传奉献、助人、忍耐及协作之类的价值观，并倡导在家庭、工作和娱乐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

政府将这些目标作为基本指导原则，并制定出 72 项指标来考核进度，还重组中央政府以保证政策的制定始终遵循这些指标。如今，不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均收入超过了印度，平均寿命由 1982 年的 43 岁提高到目前的 66 岁，儿童死亡率也从 1.63% 下降到 0.4%；新建的学校和医疗室遍布全国，扫盲率也从 1982 年的 10% 提高到 66%。最新的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不丹政府的治理水平虽然离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标准尚有一段距离，但它的稳步前进，使其排名超过了印度，并将尼泊尔远远甩在身后。

虽然取得了这些成就，不丹的发展也并非尽善尽美。有时不同的目

标之间相互冲突，需要政府做出艰难的权衡。为了实现健康、环保、平等的目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限制个人自由的政策，如禁止吸烟、禁止私人行医、规范医务人员着装、严格审批新建筑的设计规划等；纵使政府希望保存不丹的佛教文化，但电视和网络的引入也给传统价值观带来诸多威胁；年轻人到城市去寻找刺激，导致首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盗窃案件不断增加，吸毒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

更为棘手的是尼泊尔少数族裔的待遇问题带来的麻烦。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以文化统一的名义颁布了着装条例，并下令禁止学校教授尼泊尔语。随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10 万以上的尼泊尔人被驱逐出境，现在还寄居在尼泊尔的难民营中。即便那些留下的人有希望保留国民身份，要想在一个文盲众多、政令多变的国家生存也并非易事。任何人只要不能提供必要的证明就没有资格取得营业执照，不能读书上学，也不能在政府部门工作。显然，尽管政府以宽容与平等为目标，有些人却比其他入享有更多的平等权利，而这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后者的幸福感为代价的。

不过，总体来说，不丹政府取得的成绩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不管人们是否赞同政府的每一项决策，他们已取得的进步可谓成绩斐然，其严肃的进取心亦不容否定。一个国家能够以纯粹乌托邦式的胆识，将提升民众幸福作为国家的核心政策，这一点足以赢得钦佩和关注。

不丹仍然是唯一一个公开宣布将人民幸福作为政府主要目标的国家，但这一执政理念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关注。法国总统萨科奇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对民众福利状况展开调查，因为有迹象表明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正遭受着越来越多的困境。在英国，首相的幕僚小组已经准备对幸福研究的意义展开调研，以此来为公共政策提供指导，而英国保

守党党魁、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宣称：“我们不仅要让民众知道钱包鼓起来带给他们的好处，还要让他们知道内心丰实起来也益处多多。”英国、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在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考核指标的同时，也将幸福指标纳入了政府考核体系。

如何解释这种日益引发关注的趋势呢？毕竟，将民众幸福作为国家目标并不是一种新理念。实际上，将幸福的理念作为公共政策方针的做法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一些政治理论家，如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克劳德·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倡导把提升幸福、避免痛苦作为个人品德和社会道德的目的。1793年法国宪法（又称《雅各宾宪法》）中甚至宣称“社会的目标就是共同的幸福。”在美国，杰斐逊总统更把“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写进了《独立宣言》，并有超过一半的州政府将这句话引入到州宪法中。

政论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坚称，政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最大程度地增加快乐和减少痛苦，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幸福。他也因此青史留名。他阐述了一种幸福科学，政府可通过“幸福计算”（felicific calculus）估测出政策建议带来的快乐和痛苦，从而选出可以产生最大净快乐（net happiness）的建议作为公共政策。

边沁对幸福科学的梦想在当时曾引起极大的关注，即使在今天任何一本政治理论著作中仍会发现其位置所在。他所倡导的成本效益分析等决策工具后来被众人所熟知，这也使他成为功利主义时代家喻户晓的重要人物。边沁希望进一步将决策过程简化为数学运算过程，但这一主张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为了确定立法提案的净效应，无论边沁还是他的支持者，都不能解释如何才能衡量快乐与痛苦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更

不用说如何才能统计数百万人千差万别的感受了。以至多年之后，边沁的幸福计算也只是政治学者、哲学家及其学生们进行抽象讨论的主题而已。

然而，在过去的 35 年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力图攻克衡量幸福的难题，他们用到一些小设计，或直接询问人们对特定活动的喜恶程度，或者调查人们对其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如何。通过分析，调查者得出一系列结论，比如哪些活动和经历能够提高或减损人们的幸福感受，比如哪些因素最容易导致人们的满意度差异。

在这些研究中，有 4 个结论特别发人深省，因为这些结论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第一个结论是由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及一些研究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尽管在过去 50 年中，美国人均收入有了大幅增长，但人们的平均幸福感水平几乎没有提高。总体说来，虽然富裕人群要比贫困阶层更快乐，富裕国家人均幸福感水平会比贫穷国家更高一些，但美国人感到自己“非常幸福”、“比较幸福”或“不太幸福”的比例与 50 年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第二个结论是心理学家们的重要发现（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他们认为：人们在判断哪些因素可以让自己幸福时，总是惊人的失算。尤其是，他们似乎无法预测幸福可能会维持多久，无法预料哪些生活琐事或变化会导致不幸。相反，人们太看重及时行乐或不愉快的经历，却未曾意识到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和习惯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去加州享受日光浴，却并没发现比以前更加快乐；他们购买拉风的小汽车，但几周后便不再有快乐的新鲜感。当被问及什么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发生最大转机时，美国人很可能要回答：“更多的财富。”可是，正如前面刚刚说过的一样，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似乎也曾

使人们感到更加幸福。美国人已经深陷对享乐主义毫无止境地追求之中。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很快会习惯这种高水平的生活，并感到要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还是离不开更多的钱。

第三个结论由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拉斐尔·特利亚(Rafael Di Tella)和罗伯特·麦卡洛克(Robert MacCulloch)三位教授提出。他们认为：过去35年以来，美国收入差距的拉大并未使人们感到更加不满。我们曾经认为，那些生活在平均收入水平以下的人群受到负面影响最大，但结果表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并没有比几十年前更加不满，且那时的收入分配还更加公平一些。可以确知的是，对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表示不满的群体恰恰是较为富裕的美国人。这样的结论也获得荷兰社会学家路德·魏荷文(Ruut Veenhoven)的支持，他曾经研究过西方国家贫富间的幸福差异。根据他的结论，北美和西欧几个发达国家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国家间的幸福水平差距却正在缩小。

魏荷文还研究了政府在帮扶工人家庭和其他贫困群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得出了第四个意想不到的结论。在一项引起广泛争议的研究中，他分析了社会福利计划的作用（包括公共养老金、医疗体系以及失业保险），结果发现：政府重视的国民总收入与国民的幸福、健康以及寿命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像瑞典、丹麦这样位列世界上最幸福国家之列的福利国家，其福利开支的费用只占国民总收入的1/3。

一方面，魏荷文的研究对各党派人士均有一定说服力。如果美国的幸福水平差距像收入水平差距一样不平等，这个国家或许早已被社会动乱折腾得筋疲力尽。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立法作用的评论很可能会引起自由党的不悦，这些人一直在为弱势群体（如疾病患者和贫困者）再分配计划的社会立法而奔走。保守党则长期坚称，社会立法往往令那些真

正需要帮助的人感到失望，不过，魏荷文并不是保守党。他宣称自己是一位自由党派学者，他从事此项研究旨在说明，欧洲通过消减福利提高全球竞争力的这种做法，最终会减损民众的幸福水平。

上面刚刚介绍的研究结论对人们广泛秉持的一些观念提出质疑，而这些观念恰恰都涉及政府的适当目标与首要责任。如果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人们的幸福水平并没有太大变化，政府仍如此重视经济发展并将其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准，是否还有意义？如果人们不能判定哪些因素可以带来持久的幸福，那么，保守党还会继续赞美自由市场的优势，并肯定消费者为提升幸福而做出的选择吗？同时，如果美国贫困人口并没有因为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拉大而感到不满，自由党还会担心美国的收入不均，并强烈要求征收累进税，扩大政府开支，增加疾病患者、贫困家庭和失业群体的补助吗？

在摒弃传统的观念之前，我们先以幸福研究者为导向，认真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 幸福研究者到底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 他们的结论有多大的准确性和可信性？他们如何展开分析？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分析是准确的？
- 即便心理学家能够准确地衡量民众的幸福，并能够确定影响幸福的因素，但如果立法者与大部分选民的意愿背道而驰，立法者还会关注这些结论吗？
- 幸福是一种私密、自我中心、无实体的事物，它能否成为整个国家或全社会的适宜目标？假如幸福是一种适当目标的话，它会像边沁所说的那样，只是公共政策的指导吗？政治家们还有其他可以追寻的目标吗？

- 最后，如果立法者的确有意关注幸福方面的研究成果，
民众又该期望公共政策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在本书中，我将尝试回答以上几个问题。

第1章 幸福研究的新发现 001

经济的不断增长一定能带来和谐幸福的社会吗？如果金钱不一定会带来幸福，那么影响民众幸福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国家与政府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关于幸福的科学研究为政府决策带来了哪些惊人的发现？

第2章 幸福研究的优势 025

幸福的涵盖如此广泛，界定如此不同，我们到底能否准确度量幸福？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幸福研究，又是如何实现测量的呢？在做出政府决策时，幸福研究相比民意调查、政府调研，又具有哪些更有力的优势？

第3章 政府官员的幸福课 041

在人们孜孜以求的诸多人生目标中，幸福永远排在首位。那么以民为先的政府与国家，是否应将幸福作为衡量发展的目标呢？在制定政策时，立法者是否也应考虑到民众的第一需求呢？如果社会大部分人持有错误的幸福观，决策者又应该如何对待民意呢？

第4章 如何看待经济增长问题 063

倘若收入的增加并不会让人更幸福，倘若增加GDP需要我们拼命地工作、承受污染的环境，这到底有没有意义？20世纪最重要的理念，经济发展至上论，真的是当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吗？经济的降速真的就可以为民众带来幸福吗？

第5章 如何应对不平等问题 083

应对收入分配不均的方式只有劫富济贫吗？为了提升民众幸福感，政府在应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时，应该做出哪些有益的尝试？幸福研究的结论又会为决策者们提供哪些启示？

第6章 如何应对经济困境中的风险 105

当经济危机带来经济困境，个体遭遇的风险有哪些？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补贴等诸多政府法令的抗风险能力如何？在困境中，个人责任与政府的改革机遇又在何方？

第7章 狙击幸福的三大健康杀手 133

很多经历带来的痛苦都是短暂的，而一些病痛则会导致长期痛苦，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其中慢性痛、睡眠障碍与抑郁症是阻碍幸福的三大杀手。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这些疾病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呢？

第8章 和谐的婚姻家庭与社会 151

美满的婚姻、温馨的家庭、孩子的健康成长，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如果家庭关系出了问题，会给社会带来哪些影响？政府又应该通过哪些措施，做好预防工作？

第9章 教育改革与幸福社会 171

教育如何让民众的幸福加分？幸福研究的结论可以为教育工作者们带来哪些启示？旨在增进人们幸福感的教育改革之路，又该通向何方？

第10章 改善政府职能与民众幸福 197

面对民众日益加深的不满，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善人们对政府的态度、赢得信任？民众又该如何客观地评价政府工作？政府职能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第11章 幸福研究的重要性 225

幸福研究的结论可以帮助决策者做出选择，即哪一种政策最能改善民众的幸福水平。政府带头重视幸福研究的成果，会给现实带来多大改观？关注幸福研究相关结论，又会对其他优先发展的领域产生怎样的影响？

译者后记 237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第1章

幸福研究的新发现

有关幸福的实证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还尚未出现，而现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变得生机勃勃。大量研究都在探讨国家间不同的幸福状况，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幸福水平有何差异，哪些重要因素决定着人们的幸福水平^①。幸福研究成果累累，数千篇专业论文发表，有关幸福的书籍布满了各大书店的书架，相关的学术会议纷纷举行，甚至还出现了一本以此为主题的学术杂志。

“幸福”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词汇，它涵盖了感觉和情感方面的许多细微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界定可以囊括它所意指的全部含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幸福研究资深学者埃德·迪纳（Ed Diener）^②经过潜心思考，对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在他看来“幸福”即是：

① 这一主题的研究者有些使用 *happiness* 一词，有些使用 *well-being* 或者 *subjective well-being*，而另一些人则使用 *satisfaction with life*。这些术语在含义上略有差异。*happiness* 强调人们暂时的感觉和印象，而 *satisfaction* 侧重于人们对整体生活的认知和满足。不过，研究者发现不管是问及快乐还是满意度，受访者的回答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所以，研究者经常将这几个术语相互置换。我在本书中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在特定情境下会使用更为确切的术语来表示人们反应的差异性。——作者注

② 埃德·迪纳的著作《改变人生的快乐实验》中文版已于2010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注